

从抽象的“普世价值”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彭俊桦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普世价值”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思想带来矛盾和困惑,对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科学揭示“普世价值”的实质,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关键词:抽象;“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 B 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6-0001-04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n Light of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PENG Jun-hua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on “Universal Values” leads to the controversy and bewilderment in social ideology.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crucial to adhere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veal scientifically the essence of “Universal Values” so as to build a healthy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for Chines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Key words: abstract; “Universal Values”;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普世价值”是抽象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它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其统治全球的行径加以掩饰和提供辩护的一种手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植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厚土壤之中。当前,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自觉抵制“普世价值”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影响,为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清除障碍。

一、西方文明视野下抽象的“普世价值”

不少人认为“普世价值”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甚至引用马克思在某一具体语境下说的话论证这一点。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普世价值”根本不具有普适性。

对于人类社会不断趋向全球化,从而带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一现象,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

收稿日期:2012-06-01

作者简介:彭俊桦(1981-),男,广西贺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就是根据这一点,有人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印证了“普世价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人类从古至今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共识,比如说恻隐之心、诚实、不偷盗等等。然而,由于缺乏真实的承担主体和社会现实土壤,“普世价值”只能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对此,可以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发展历程作一简单分析。

一般而言,普世价值是指普遍适合全人类的有共同性的指导观念。人们价值观上的“普世”问题产生于西方社会,在基督教早期(大约公元2~6世纪),教父哲学家极力论证并倡导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公教会的正统教义,这个正统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说,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是“普世价值”的雏形。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开拓市场,他们不仅在全球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而且把他们引以为傲的西方文明当做“普世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西方世界,还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谓的“普世价值”根本不具有普适性。这是因为,基督教早期的教父哲学家运用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合理性,并制定公教会的大一统的具有普遍性的教义,其目的是确立原本只是当时众多教派之一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地位;而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普世文明的目的,是为其统治全球的行径加以掩饰和提供辩护。由此可见,“普世价值”与基督教教义同样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对于西方文明,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作了这样的说明:“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社会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2]55-56}。亨廷顿进而揭示西方普世文明的实质:“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2]56}。从以上分析可知,“普世价值”根本不具有适合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因为它不是对拥有不同地域、语言、思维特点、风俗习惯、经济条件、社会制

度等因素的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合理抽象而来的真正的价值共识,相反,它专断地抹杀了其他民族尤其是不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思想个性,仅仅把西方的价值共识抽取出来并主观地上升为适合全球的普适价值,所以“普世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纯粹抽象的价值观。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呢?事实上,马克思描述“世界文学”这一现象,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全球化这一过程是有前提的,即它是由资产阶级所推动和主导的,从而带来全球范围内弱肉强食的后果:“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6}。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仍然被分裂为对立阶级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现实性和普适性的“普世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3]435}。因此,马克思在具体语境下所说的“世界文学”,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具有合理性的依据。

二、民族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前文指出,在私有制、国家、阶级等外在强制性因素依然存在的条件下,绝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而具体分析全球化这一现实过程,可以使我们更明白地看到,民族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绝没有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相反,它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维度展开说明:

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一定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特性,并能给一定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价值体

系的变更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社会形态的变更。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或者体现为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中国的“三纲”、“五常”,或者体现为西方世界的“君权神授”,以及以服从、忠诚为主要内容的“骑士精神”;而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体现为“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它必然倡导不同于私有制社会的核心价值,如“集体主义”、“奉献”、“团结”、“和谐”、“公平”等较为先进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的历史选择”^{[4]2}。当今世界,虽然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但是,只要各民族国家还存在社会形态的差别,就必然积极维护和建设作为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核心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许多民族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对民族性受到削弱、传统文化价值现遭到破坏、民族凝聚力日益丧失等问题的担忧,日益注重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维护和建设。前西德总理施密特指出,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由美国主导的“娱乐工业正所向披靡,不仅席卷德国,而且席卷全球,冲击整个世界的任何地方,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边远城市……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低廉的乃至十分不良节目的全球化正在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5]62}。正是因为全球化会给民族国家的传统带来损害,所以施密特深感忧虑:“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且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5]62}。施密特从而呼吁:“从现在来看我们欧洲人和德国人必须谨慎从事,防止全球化来侵蚀我们自己的语言乃至文化”^{[5]65}。不止是担心美国强势娱乐文化冲击民族传统的国家希望巩固自身的核心价值,就是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非常警惕本国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对其核心价值的破坏。例如,亨廷顿极力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者拒绝接受美国的文化遗产

的态度和行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2]353}。对于极其重视文化作用的亨廷顿来说,“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2]354}。由上可见,作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施密特和亨廷顿都没有不加区分地宣扬抽象的价值观,反而十分重视并极力维护本国的传统价值观。这不仅从反面表明了“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使我们看到核心价值对于民族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尤其要构建和维护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众所周知,20世纪晚期,由于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拉美多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不仅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而且造成民众思想混乱,社会问题丛生;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日本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大力推进经济和科技发展,另一方面,它们根据发展需要保留并更新中国的儒家思想,由此创造了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经常被誉为“儒家资本主义”。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坚守自身的核心价值,才能给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团结带来强大的凝聚力量,反之则会导致一国陷入社会发展的困境。

三、警惕“普世价值”,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综上所述,“普世价值”缺乏真实性和合理性,因而它不应当成为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如果不加批判地认可、宣扬“普世价值”,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带来诸多干扰,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人们不无担忧地看到,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等一些领域产生了推崇“普世价值”的现象。例如,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贬抑辛

亥革命的进步作用、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经济学领域,一些人偏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而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极力为自由化、私有化进行论证和辩护;此外,“在伦理学研究中,将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终极伦理原则的尝试正在进行。在伦理话语内部,“正义”、“公平”、“大爱”、“大善”、“人性”日渐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其理论基调也呈现出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态势”^[6]。当前思想领域产生诸多矛盾心态和混乱现象,都折射了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的消极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一些人推崇新自由主义、宣扬“普世价值”时,西方新自由主义却正步入式微,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拉美等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并毫无区别地将新自由主义原则应有到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因此不仅没有促进这些国家发展,而且加重了这些国家改革的难度。对此,雷默指出:“我自始至终地观察了‘华盛顿共识’,毫无疑问它失败了”^[7]。而“中国模式”却给发展中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可见,当前对“普世价值”过分推崇和积极宣扬,不仅反映一些人缺乏应有的学术自信和学术信念,而且必然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难度。此外,“普世价值”之争并不会只停留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价值诉求。因而,当前深入揭示“普世价值”实质,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总之,“普世价值”不可避免地会干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对此必须警惕和防范。但是,反对“普世价值”并不意味着要拒斥世界的文明成果。事实上,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要遵循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达成超越民族国家的一定的价值共识。然而,“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无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为什么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引中国的改革实践”^[8]。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时就指明:“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435}。同样地,要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而且直接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在于它不仅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反映了文明、富强、民主、和谐等根本的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和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现实性、丰富性和科学性区别于西方文明视野下抽象的“普世价值”。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才能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正确的价值导向、健康的舆论氛围以及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李从军.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前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5](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6]武卉昕.普世价值”的道德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136-140.
- [7]俞可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 [8]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48-52.